

忙
忙
忙
忙

卖艺黄家说忙道闲



大忙大闲

黄宗江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忙大闲·偷忙偷闲 / 黄宗江著. -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3.3
(二指丛书)

ISBN 7-219-04748-7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4576 号

图片提供 黄宗江

总 策 划 江 淳

策划编辑 罗宇飞

特约编辑 桂 苓

美术编辑 李筱茜

装帧设计

责任校对 农向东 杨 冰

大忙大闲·偷忙偷闲

黄宗江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: 530028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开本

7.75 印张 159 千字 76 幅图

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ISBN 7-219-04748-7 / I · 721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- 《大忙大闲》自序 / 1
- 寄冰心大姐 / 3
- 火种萧军 / 8
- 贺佐临恩师八十寿 / 13
- 我师夏衍 / 22
- 好男唐纳 / 34
- 忆石挥与蓝马 / 36
- 诗魂君里 / 50
- 孙道临是一首诗 / 57
- 春晖秋映咏谢郎 / 65
- 清风亭下哭信芳
——周信芳大师九十诞辰祭 / 67
- 马嵬坡前唁慧珠 / 75
- 遥想君秋
——六十载追星如水 / 77
- 人活一世 精彩万分
——新风霞七十年 / 81
- 场上案头一大家
——怀近邻周贻白 / 83
- 赞苗子·歌郁风·怀夏公 / 86
- 哀江南 忆田汉 / 87

怀岁月 忆南开 念恩来 / 90

表演艺术的辩证法

——兼论石挥、蓝马、金山、赵丹 / 91

我的芳邻侯宝林 / 101

“你不像季羨林” / 106

大雅大俗大洋大土

——泛论学者演员英若诚 / 109

尚小云的“热流” / 112

说说尚长荣 / 114



《大忙大闲》自序

忘年小友桂苓邀我自选文字一卷，以入其所编《休闲文丛》，我有所踌躇。盖生活八十载悲欣交错，伏案弄笔时尤不轻松，故对休闲云云，既不反对，也不想提倡。不久前见我熟识的一青年鬼才吴欢在凤凰电视台上，称屈原之作属上乘休闲文学，意在如不蒙朝廷离弃亦难得闲赋骚云云。老朽保守，难以苟同。惟再思忖，亦可代圆其说。悠悠此生，每予大悲中悟大欣，又于大欣中悟大悲；大忙中

求大闲，大闲中求大忙；此大悲大欣，大忙大闲，岂又非大雅大俗相通之道乎？乃正襟危坐，欣然命笔，编选杂著，略依类别时序，不计悲欣雅俗忙闲，“歌德”或“缺德”也。

廿一世纪之初年仅八旬



寄冰心大姐

许久许久以前——提笔这一句，怎么像是幼时读英文童话常见的 Long long ago。How long? 半个世纪以前吧，当我还是个真正的小读者在读《寄小读者》的时候。其实这本书还是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，冰心就写了，我可还以为就是当时给我写的，就想写封回信给作者，不，不是作者，是给大姐，又不好意思写；后来，半个世纪以来，我还常想一写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就越来越不好意思了。近来，又常常想写，更惦记她了，为什么？也许是因为藻去了，永远地归去了，古云西归了。

我说藻，看来是非常熟悉乃至亲密的了，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，还是在不久前，“文革”后，也有好几年了，我第一次到大姐家，也是至今惟一的一次，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吴先生，没再说什么，没有暴露自己在端详他，端详着我心里的他，那是在他和大姐尚未结婚的时候，大姐“南归”省亲，在母亲逝去的日子，他伴随着她。我像是所有的小弟弟揣摸大姐的爱情一样，难深然亦够深的。我有好几十年重读《南归》了，但那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，一起生活着，说不清为什么，里面写的不外是冰心常写的大海和母爱，我似乎也沉浸在那大海似的母爱中了。于是我心里就有了这样一位“藻”，而不是“吴文藻先生”。

我和大姐的真正见面是历历可数的，历历者言其少，又言其真切；可数亦言其少，又言其可贵。我记得，第一次我恍然见到冰心，是在她的也是我的母校，那美国人司徒雷登先生创办的燕京大学的图书馆，我在善本室调阅了谢婉莹的毕业论文



文，写的是关于元曲的。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论文都珍藏在善本室里。说实话这本论文看样子可够不上什么善本，还是用钢笔写在一种横格练习本上的。其内容也的确属于一种练习吧。但此文此本此情此景，我历历在目，对我是如此可亲可怀，我想到的是，当年，我这位没见过面的前辈同窗，也就坐在这未名湖畔的窗前……

说了半天，我那时还是没见到她本人。我第一次见到她本人，见也匆匆，是在解放后，三年灾害中。小妹宗英带我去昔为欧美同学会的今日政协餐厅，去吃较便宜的高价饭。宗英突然高呼：“大姐！”随即和她热烈握手，介绍道：“您认识吧，宗江。”其实不认识，我也含混不清，似叫未叫地叫了声大姐。我只是感到此老精神抖擞，同宗英一样的抖擞，也许是和宗英一样的撑着抖擞。一个人能撑着，便抖擞。

我确切地见到她，是“文革”后的一次专程家访，就在这次也见到藻——吴文藻先生。我是请老学长侯仁之带我去的，因为他们之间时有往来。我称呼了一声“冰心大姐！”地理史学家侯仁之马上纠正我：“怎么叫大姐？要叫谢先生！”侯老自己总是尊而又敬地称谢先生的。我心想，革命队伍里都是这样称呼的，连小妹宗英都这样叫，侯老过分泥古，我也就继续坚称大姐。我所以来见大姐，是因为呈递一本美国人写的电影剧本，歌颂我们的母校燕京大学，也就歌颂了前校务长、前驻华大使，在毛主席的书里“别了”的那位司徒雷登。当时有权威认为此剧可拍，可中美合拍，我认为不可，又难以说服，便想请出另一位更大的权威来压服。大姐果然说：“你怎么揽这么个买卖？”我说：“不是我揽的。”她说：“谁揽的叫谁退去！By

the way……”我大悦，如得法旨。老太太闽人闽相，毫无闽音，好一口京片子，却喜欢“by”这么一下子。她还说起曾和司徒雷登散步路过还未放水的未名湖底，司徒告诉她，明天就要放水了。真是沧桑呵！冰心是怎样的一位历史地理的见证人哪！怪不得仁之要称谢先生。我不知怎么说到：“人家说咱们崇洋媚外——”她嗖地抢过话来：“我们才不崇洋媚外！”我又大悦，的确如此，因为我们这些喝过、引进过一些洋水的人，对洋与外这方面不是那么全然无知的。

By the way，此后我们还见过几次，两次。一次是在上海，她方从海外归来，我同小邓（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子）去看她，她精神抖擞。一次在北京医院，她就住在赵丹临终病室旁边那间，宗英邀我一起看她，端了一块日本朋友刚送给赵丹的蛋糕去转送，因为赵丹已经不能吃了，虽然还在胡说八道。大姐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们，也说了许多，她躺在床上，不能动，依然精神抖擞，越发抖擞。还是那话，能撑着便抖擞。

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，一封。我有一次外出还是在上海，在新华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一本新出的厚厚的冰心散文集，包括了《寄小读者》，一问已售罄，失望之余便大存希望地给她写了封短简，要她送一本给我家三代读者——我和老伴、女儿们，还有孙子。她果然寄来一本，还署了给亲爱的三代读者之类。这本书现在找不到了，我就赖完女儿又赖孙子，一般是一赖就准的，他们总是从我书架上乱拿书，这回也许又是我的小女儿连同唐诗宋词等一起带到美国去了。她在美国念的是“右派学”（我常这样戏称社会学，也就是吴文藻先生的专业），但深有孽根地总幻想着文学写作。我想到她的年龄、处境和当年冰心在



美国时差不多，曾对她说过：也是该写你的《寄小读者》的时刻了。

以上都是些身边琐事，却有一件切身大事不可不提，我生平第一次批判的人就是冰心，不是被迫地，而是高度自觉自愿地。那是在我第一个自传里，在解放初期镇反运动时写下的，想到纠缠了我半生的决不是蒋介石，更不是司徒雷登等等，而是那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人道主义，我必须和它彻底决裂，其根源当在于少时读过的那些书，我首先点的就是冰心，依自己读书的时序再就是巴金，再就是托尔斯泰、罗曼·罗兰等等显赫人物了，奥尼尔之流数都数不上。我认真地批了自己，也批了他们，怎么批来批去总批不清呢？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虽然还要我继续联系蒋介石、司徒雷登，乃至孔老二、刘少奇，但实在联不上，我只得继续批冰心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有所松动，我就常去看一位把我拽入“黑线”深渊的恩师曹禺。我们认识较早，但平日很少去看他，因为自己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总未能炮制出笼，如今都是退出历史又退出舞台的“一丘之貉”，也就平起平坐了。当时我的小女儿偷读了曹禺的全部剧作，我带她去看曹禺，让她戴上红袖章，就说是来批判的。女儿张嘴就问：“周冲是个什么样的人哪？”曹禺顺口就答：“修正主义分子！”又一次，曹禺把一大摞灰色封面内部出版的苏联有关人道主义讨论的书籍，一股脑都塞给了我，说“我研究不了这个，你拿去吧！”后来，我又对苏叔阳说：“我研究不了，你拿去吧。”他大概是研究了，所以批人道主义还批得振振有词。在那样相濡以沫的日子里，曹禺也对我交心地说过：“说我是‘反共老手’？我自小就不反

共！”我立时倾心地附和：“我也自小就不！”这不能不引起自己的深思求索。在曹禺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初版的序言里，他就隐喻地叙述了他是如何痛苦地读过“洪水猛兽”似的书籍；而我自己呢，幼时曾居青岛，在近邻的一个“荒岛书店”里，购置过鲁迅、艾思奇的书，以至唯物论等等，说实话，我并未通读，更未读通。想而又想，我得到了一个真实而又奇怪，甚至有点怕人的结论：“我自小不反共，因为读了冰心、巴金……”怪矣哉！那不是一些“洪水猛兽”的书籍，甚至有着过多的“温柔敦厚”，也属于“人道主义”吧。但这些书籍使我向往光明，追求理想，求索爱的泉源，憎恶恨的来由。

我听到过不止一个老同志告诉我，他们是读了巴金的《家》才走向革命的。当然，《家》决不是一部宣传共产主义的书，巴金自己也没那么贴过金，遑论《寄小读者》的作者。“文革”后在今生又重逢的日子里，见到了多次共过运动的公刘，我把这层意思跟他说了，他肃然说：“《寄小读者》的读者是不会反共的。”这又是一位所谓的“反共老手”。在当年的肃反运动中，我居然受命看管这位诗人。他那时当然不想作诗了，把腰带勒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而未得结果，我这个“狱卒”当然也挨了点剋。公刘把一个想学写剧的弟子介绍到我门下，我告诉他我早就批斗过公刘，弟子问：“批得怎么样？”公刘莞尔：“宗江是个没办法的人道主义者。”好个“没办法”！在那些运而动之的日子里，我是多么渴望着一种起码的“人道主义”，哪怕是“虚伪的”、“超阶级的”……当然，我向往的是一种更其完美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。

我不讳言，我坚信，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，起码是一个



共产主义的追求者。我相信冰心也是，巴金也是，曹禺也是。我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，想到自己的书架上曾经有过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乃至《先知》……他们曾促使我向往、追求没有剥削、没有压迫、人能相爱的理想的社会。祝福你，亲爱的冰心大姐！您是一位爱的使者。我祝愿你长久地精神抖擞！我们迟早都要和藻会合在一起，我们迟早都要有“南归”、“西归”的日子，但我相信在你继续抖擞的日子里，你还会不断地散播着爱的种子，撒向人间都是爱，那种阶级的爱，乃至超阶级的爱。我不会称你伟大，就像对我亲姐妹一样，你们在我心底都是了不起的。我还是不好意思给你写信，这是不是就算写了呢？写给你，也写给还对我们感兴趣的我的、更是你的小读者和老读者们。

火种萧军

萧军原住在当代京都后海北岸，我住在南岸，遥遥相对。如今我仍然沿水漫步，常想起这条像是从山里杀出来的好汉，似乎我仍在和他隔海相望，不，隔世相望了。

如今我也到了朋辈半为鬼、师辈多为鬼的年纪了。真有这样的感觉：一位师友去世了，像是自己的一部分，跟别人谁也说不清的一部分，和他一起死去了，但似乎又有他的一部分活在了自己身上，也难为他人细道了。如此说，像是我和萧军很相知了，并不，不很知道，很不知道；那我又凭什么提笔为文，水边一祭呢？那是因为我们虽说不上相知，却相识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。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，在那种少年多老成的年代的

一少年。准确地说是1934年夏初，我13岁不到，家住青岛，经常到“荒岛”去徘徊。“荒岛”是一家新开的小书店的名字，坐落在一个叫做东方菜市的一角，称做“荒岛”，可真不荒呢，是一处传递“火种”的所在呢。在那一间四壁是书，中间只摆着一个书案的小屋子里，我在那里头一次见到、读到《铁流》、《毁灭》、《士敏土》、《石炭王》、《解放了的堂吉诃德》……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、高尔基的《母亲》……当然还有鲁迅、巴金……从幼小的我来看世界，可以说那年月的全世界都在那儿了。管店的主人叫老孙，是他，世上头一个问我这样的话：“小黄，你信仰共产主义不？”我答：“我很幼稚，还没有找到信仰……”由于自己当时还小，老孙还称赞了我。也还是他，指着在书店一角翻书，穿一身旧黑西装，当时蛮俊秀的青年：“他叫萧军，在上海的《自由谈》上发表过不少文章。他给鲁迅写过信，鲁迅回信了呢……”一天老孙找到我和另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同学，应该说也是个孩子，如今是白发苍苍的新华社离休老记者李普。老孙说萧军在《青岛晨报》办副刊，要我们俩在报上办一个少年周刊，就叫它《黄金时代》。我用笔名江子。李用笔名弹舞，办了几期，并无外稿，便成了我们二人的同人刊物。那时候还真大胆，什么诗歌、小说、戏剧都敢写。我还居然开始发表了个多幕剧叫《光明的到来》，写的是工人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。发了两三期，一天萧军和老孙笑着对我说：主编认为太激烈了，删了几句；我就做一怒状，自动腰斩之，其实我真是弄不清这光明如何到来。我想萧军也许清楚，也许也不清楚；但是我相信萧军是一位光明的追求者，自昔至今，一往向前。

行文至此，不免有些顾虑，写悼文最忌大说自己如何如何，



但不把自己摆进去也就无从真切，好在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诩而只有自卑的。五十年后，80年代初，天晴日朗，在北京为萧军举行了从笔半世纪的纪念会，我也应邀参加，不禁自嘲：自己也可说是从笔半个世纪了，只落得“一事无成两鬓斑，叹光阴一去不回还……”（引自萧军著京剧《吴越春秋》中伍子胥告老辞）

回到半个世纪以前的1934年。秋天，我父亲死了，举家北迁，我告别了“荒岛”，告别了萧军，告别了自己的童年。又一个小十年，1943年春我从上海至重庆继续演剧生涯，又遇见了小同学也是老同学的李普，当时他是从延安派到重庆来做《新华日报》的编辑并记者的。他告诉我萧军在延安，还是挺红火的，那位“荒岛”的老孙也在那里，乃想到自己还未能切实地回答关于信仰的问题，但我确实地为这些勇敢的光明追求者庆幸他们追求到了光明。又若干年，全国解放，我见到了一本东北新华书店出的批判萧军的文集，我才知道他倒了霉，撞了墙，在批评苏联红军在我国东北之役违纪等问题上犯了大忌。我和萧军多年来再无往来，也就事不关己。当年有这么一种习惯看法，凡是遭受“大批判”的人，准定错的是他，罪有应得。后来被批判的人日多，更是习以为常，只要不批到自己头上，就很难动心。就那么无动于衷，就那么冷酷无情吗？对大多数人包括我来说，就是那样，容或有些怀疑，也只是存疑，多不去深想，亦不为他人道，就那样浑浑噩噩地自保，最多有一星良知未泯，也不知泯在何处了；这种良知只有在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中才扩展起来，那是后话。如今回顾，一个人敢于如此指出光明中的黑暗，太阳里的黑斑，正义之师中的不义，是

何等的勇士，大智大勇的勇士，正像是马克思、鲁迅、张志新……诸先贤都赞美过的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，为了把火种带给世人，忍受着上天严惩，剖开胸腹任鹰鹫叼啄。

我认为女巫江青可做了一件大好事，那种变坏事为好事的大好事。她和她的同伙们把这么多人都打成了反革命，这么一打反使人不得不认真思考怎样才是真革命。她这么一打，打烂了同一阵营中的各个山头、各个宗派，都打到一起来了。她这么一打，打出了不少坚持真理、敢说真话的人。风暴过去，幸存的人们不禁相互奔走，打听谁不幸被迫害致死，谁还侥幸存活，谁活的更是坚强。萧军原可属于或可免遭狠打的死老虎，但他们一旦发现这老虎打而未死，甚至打也打不死，他们就打得更狠了。相识又相隔半个世纪，尤其是大劫之后，我是很想重见这位亦师亦友的兄长的。他女儿萧耘领着我骑车越过后海去拜见他了。他沿岸而居，风景这边独好，却是杂院危楼，倒也符合他的性格。于是叙旧话新，送书赠字。此后一年半载的，我也去过一两趟，不便多走，我是懂得珍惜老作家的时光的。我认识了他的老伴和闺女，直感到她们真好：她们限制老头抽烟、喝酒、吃肉，帮他抄抄写写，帮他整理他和往昔女伴的情书。我着实感到这汉子晚岁，身边有着多么好的小妇人们，这对一个不幸的男人、老人是多么大的不幸中的大幸。

我的书架上过去有他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、《五月的矿山》，早已不知去向。也要感谢红卫兵用封条封了我家书架，为我保存了那本“萧军批判”，留下了多么可贵的资料。萧老又不时地送我几本新作。我意外地见到了他那卷京剧连台本戏《吴越春秋》，如此地不避大俗，不媚大雅，诚大家也。俱往矣，我匪夷



所思地想到如有人写一部《今朝春秋》，萧军该是什么样一个悲壮人物？自古至今，在朝在野，“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”，有如亘古“春秋”所纪——或遭放犬恶啃，或剖心明志，或头悬国门！……

某日黄昏时候，萧老突率妻女渡海光临寒舍，只说是来看看，我和老伴不免受宠若惊，也没说上什么话。临行他留书一册，是《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》，只扉页题辞便令人感慨何可言说，是“1977年8月间……于故纸堆中偶尔捡出了这批书简……”那都是1936年至1937年萧红自东京寄至上海、青岛给萧军的信，事隔四十载，几经沧桑、兵火、天灾、人祸……

北京是一个近在咫尺、难相往来的都市。这几年我海内海外，进进出出，没注意对岸的萧军危楼何时拆除了。我尚未及寻访新居，忽一日报端猛见萧老逝世简讯，又得邮寄讣告。一数头衔便有一十七个，官方的规格是不低的。萧老是个受过大委屈的人，理应有此礼遇，但是归根结底，萧军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头衔，赤条条来去的好汉。此后在报刊上见到不少悼念文字，真不算少，民间悼念的规格是尤高的。这里一篇那里一篇，不说那身后哀荣，可真是去思无限，名人文章也有，更多出自不知名之士，道出了些萧老生前在日常生活里的只言片语，却都是那样的豪迈，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感人肺腑。我真有些后悔，过去总怕打搅他，没有多骑车渡海几次，亲聆教诲。我开头就说过了相识甚久，相知甚少，但仍思一抒情怀，那是由于深深地感到这样真的人，这样说真话的人，不多了！——不，这样真的人还不少！这样真的人永远是不多的，也不会少的，

所以人还是值得活下去的。那种追求并携带着真理、火种、光明，而不惜拼却一生的人是永生的！那像是从长白山里杀出来的好汉啊！容晚生晚死者隔海水边一祭。

贺佐临恩师八十寿

1942年秋，以佐临师为首的苦干剧团在沪成立，我因犯小人，未能参加，拜别了吾师，从此便未一起工作了。实际上我亲受其教诲的日子不到两年，但我们的师生之谊有形无形地贯串了近半个世纪，未能相忘于江湖也。“文革”后佐临来京，似出偶然地对我妻说：“宗江来上海演戏时十九岁，宗英十五岁……”如今我六十五，年逾花甲，直逼古稀，小妹老太则已六十晋一。我掐指算来，佐临当年应为三十五岁，风华正茂，然在我辈眼里他已经是一位挺老的老师了。那年他正为我们导演《蜕变》，同台大半已为鬼：石挥、严俊、韩非、杨英梧……均已作古，尚存的则有丹尼、胡导、梅村，在台湾还有位葛香庭，或还有谁，当然还有我，演的是衰派老头况西堂。已故梅派诗人唐大郎誉称这一台戏“惊才绝艳”，斯亦可称绝响矣。

我不免艺人文人恶习，或怀旧，或伤时；看来佐临师一向不是如此，他身居剧场，却从不自作多情。那次他似乎漫不经心而又居然准确地说出了我当年的岁数，我不禁为之默默地激动。他显然记得过去的一切，但是很少说起，或索性不说。其感情素来蕴藉深藏，我们曾背地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“暖水瓶”，这也是我中国或东方独有的。

